

风物 深度

香港独立出版剩下的一口气：“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既然留下来，还有什么书可出？“情势比人强，唯有做回自己，透过出版寻回我们的独特性。”



“香港人书展”开幕前一日收到代表业主的地产公司通知，指“香港人书展”将场地“分租”出去，有违租约协定，要求立即退场。几经沟通之后，主办方决定取消实体活动，转为网上书展。图为山道出版社负责人杨子俊在场内记者会前准备。摄：林振东/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黎家怡 发自香港 | 2022-07-22

香港独立出版 香港书展

[illegible]

第32届香港书展前日（7月20日）升晷两日，人流少过以往；“综合书刊馆”参展单位计132间，也较去年的160间为少。今年主题为“历史文化．城市书写”，而此前5月，[新闻](#)称三家出版商申请参与书展“史无前例”被拒，其中两家的书籍正是因书写反修例香港而于去年书展遭到投诉。

出版社被拒，参展商减少，并非完全出人意料。港区国安法实施两年来，香港公共图书馆与中学图书馆都有[新闻](#)指下架“敏感”书籍，相较之下，有人质疑书展的安排是言论自由再倒退的续章。被拒方如何应对？今次被拒三家，都是独立小众出版社，其中山道文化发起举办“香港人书展”拟另寻出路，但也在7月14日预定开幕前一日临时取消，最终只能改于网上举办。

创办自1990年的香港书展，每年在湾仔会展举行，入场人次数以十万计。多年来，书展陈列一直光谱广阔，各类立场的政治书籍均可摆卖。而出版社不论规模，只要应付到摊位费用都可同场展销。今次独立小型出版社被拒，民间自发书展也无法成事，这是否提醒人们，在香港出版业，官方主旋律外的非主流声音正进一步被边缘化？本文盘点时至今日香港独立出版于每个步骤都可能陷入的重重困难，考察业界中人做何打算？

要先说明的是，关注独立出版并非仅止关注小众。虽一般理解其受众较为“小众”，但正如有出版人以病毒为喻，“如果社会只有单一物种，一单病毒入侵，可能全都死光；如果有不同品种，可能不至于灭绝”。究其实，独立出版社于公共生活中，一直承担著拓阔公众资讯接收光谱，维持社会舆论多元与丰富等功能；今日情境下，更有部分关涉大众利益的书籍因香港言论自由缩小，由独立出版社出版（部分独立出版社一直以来也有出版此类书籍）。

“香港书展绝对是出版界寒暑表”，但“在荒谬的社会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第32届香港书展，不少大型连锁书店的摊位都在显眼处摆放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籍。摄：林振东/端传媒

书展历史上“闻所未闻”：同业看见也不安

另一小型参展商见状大表不安，选择不具名受访，表示对“迫人退展”的做法“感到惊讶”，“做法颇为恶劣”，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无形的压力”。

多间传媒报道至少三间出版社申请书展摊位被拒，是距离书展开幕仅余两月之时，业者形容情况“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被拒入场的出版社包括有种文化、山道文化、蜂鸟出版，分别成立于 2012、2015 及 2018 年。

其中，“有种”以破格见称，自言为了“对生活还保留一点感觉的读者”，早年将网络小说制作成书，如《一路向西》、《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近年出版不少社运相关书籍；“山道”关注社会议题，由监狱文学邵家臻《石墙生花—坐监记及其他》到近月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制作的《乌克兰照片集》；“蜂鸟”则多做历史普及，出版如《空白的一百年——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香港历史》等。

去年书展三间都参与了，其中“山道”的《逆权教师》、《元朗黑夜》及《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三种被指违反国安法；“有种”的《每一把伞》及《我们的价值》收到投诉；“蜂鸟”未有相关记录。至于今年为何拒绝？出版社曾向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下称贸发局）要求解释，局方未有交代。7月5日书展记招会上，贸发局面对传媒亦重申“不评论个别个案”。

山道负责人杨子俊，也是三年前2019年6月12日的“爆眼教师”，他被拒后发起“香港人书展”，在传媒预展上表示，其他参展商过往未陈列政治书籍，而“山道”与“有种”同被投诉过，判断当局做法出于“政治决定”。“香港书展绝对是出版界寒暑表。”杨子俊指，贸发局作为公权力机构，是否容许异见声音，反映官方对香港出版界的要求。有种文化负责人Daniel却称遭遇“不意外”，“在荒谬的社会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如前所述，一直以来香港书展现场售卖内容多元，2019 年反修例期间，场内更有摊位设置连依墙，发售运动相关小志；至去年因疫情停办之前，对香港大部分出版社而言，书展机制“持之有效地运行超过三十年”，于今，三家出版社失去参展机会自难免担心影响销情，惟其中Daniel继续审慎乐观，相信“好书有没有书展，货量都一样流转，只是速度没那么快”。



有种文化负责人 Daniel 。摄：林振东/端传媒

对同业被拒入场，参展多年的独立出版社茶杯杂志出版有限公司编辑何杏园感叹，事件或导致读者对书展览观感变差，减低入场意欲甚至杯葛。如其担忧的，此前不少网民在有线新闻和《明报》等媒体报道下留言，批评主办单位做法侵害言论自由，甚至呼吁公众“罢去书展”。因此何杏园估计，今年书展人流和销售有机会是近年最差。

而另一间仍有参展的小型出版商也大表不安，担心随时被撤回参展资格，他们选择不具名受访，表示虽然被拒事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对“迫人退展”的做法仍“感到惊讶”，称其没有交代理据，“做法颇为恶劣”，被拒方又无上诉渠道，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无形的压力”。

民间书展：官习吕刀书展刀庭机礼，以后呢？

独立出版机构始终有种独立精神，有各自关注的议题，“众声喧哗，正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持续生命力的关键”。

其实书展参展成本动辄逾万港元，更多独立出版机构因费用高昂未能入场。独立出版界普遍认为，书展偏向服务大型出版社，发售书籍亦面向普罗大众。而独立出版社无论是文艺还是社会议题，各有关怀，只是他们往往员工人数不多，不少更是“一人公司”。像“有种”目前全职人员只有Daniel一个。因应个别出版项目，他再另约编辑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参与。资本虽然有限，但胜在灵活运作，如独立书店艺鹄（ACO）店长连安洋所言，独立出版是创意的体现，“因应每个作者的成本和能力去做书”。

2017年，香港独立出版业者成立“52Hz出版联盟”，组合香港小型出版社，[跨海参与台北国际书展](#)。联盟出版社数目自此每届稍有增减，维持于15家左右，定位由文艺流行至学术普及。2018年，52Hz于香港书展期内，在湾仔富德楼艺鹄书店联营另一场独立书展：“独立出版迷你书展”。因有艺鹄统筹销售，独立出版单位无需付出固定人手即可参与一场特别而独立的书展。连安洋解释，艺鹄初心在于眼见独立出版人受限于产业结构及规模，无法进入书展大舞台，想趁书展期间香港人关注书业，另辟蹊径，让更多人见到独立出版身影。

相对于依托大型发行商及书店的主流出版社，独立出版机构始终有种独立精神，有各自关注的议题，连安洋说，“众声喧哗，正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持续生命力的关键”。

去年，迷你书展参展及合办单位计12家，因应疫情延期至10月举行而依然无损人流，举办地富德楼是旧式战后唐楼，只一部升降机（电梯）上落，排队人龙虽很长，但几乎所有人都耐心等待。今年临近书展档期，也不时有读者到艺鹄购书时表示期待活动再办。但连安洋不敢轻下承诺今年依然由艺鹄举办迷你书展，只可以肯定今年一定不会在香港书展同期发生。她强调活动“不只是艺鹄的事”，各人都可对迷你书展有自己的想像，“事情不需要因循。谁想承传，谁就继续做下去。”





“香港人书展”场内的告示。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边厢“迷你书展”停下思考前路，那边厢山道因被拒而自发筹办“香港人书展”。杨子俊认为两者不尽相同：“香港人书展”较通俗，面向大众；“迷你书展”则倾向文艺，受众也以文青为主。以另组书展去回应被拒，杨子俊强调无意与香港书展明显对抗，目的在于“补充香港书展的不足”，陈列本地出版及香港人关注的议题读物。两者展期亦不重叠。就7月13日传媒预览所见，山道继续发售去年于书展被投诉的出版物。不过，杨子俊强调去年贸发局只知会收到投诉，此后未有进一步跟进，亦未发出警告。

山道没有收到当局直接干预“香港人书展”。直至活动开幕前一日，他得悉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有意于开幕后派人视察，判别发售书籍“是否有危险性”。同日，他亦收到代表业主的地产公司通知，指“香港人书展”将场地“分租”，有违租约协定，要求立即退场。几经沟通，山道终决定取消实体活动，转为网上书展。公布消息的帖文下，不少网民尊重搞手尝试促成其事的努力，又批评业主“打压”。杨子俊认为事件“惹人猜想业主可能收到某种讯息”，感叹“恐惧继续蔓延，连私人市场的空间也不再”。

说不清的红线：无缘无故恶梦，但也习惯了

“常说‘不犯法就自由’，实际是‘不冒犯就自由’。”“当局随时都可以定义犯法的标准。”

眼见出版社会议题、书写香港历史的出版商被拒门外，制作其他题材书籍的业者也担心，红线早晚压到自己身上。参展的不具名小型出版社负责人坦言，要维持一直以来的出版和创作方针，又要确保机构上下人身安全，“只可摸著石头过河”。他透露近年虽未至于收到人身威胁，但的确受到一些滋扰，认为现时社会缺乏清晰准则，出版社难以判断“何时过了界”，“常说‘不犯法就自由’，实际是‘不冒犯就自由’。何时冒犯

到要用法律手段来制裁你，标准其实没人知晓。”

何杏园同感无法判断安危，“即使没说出那些敏感字，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读者可以是任何人，可能在书店随手翻到某本书，觉得有问题就去投诉你”。与其评论个别机构的风险，连安洋更忧虑当局对文化界整体作出打压。出书卖书，机构从不做任何违法的事，但“当局随时都可以定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义犯法的标准，“我们只可以在你判定某些行为犯法之后，不去做那些事；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茶杯”的执行总编辑陶培康（左）与编辑何杏园讨论出版物设计事宜。摄：林振东/端传媒

“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茶杯”执行总编辑陶培康也是香港中小企书刊业商会干事，他认为出版虽“有信心做”，但“没以前那么容易、那么快乐”，以前内容有意义就出版，现需更多深耕细作，“以前有些书的内容可以说，现在都不可以了”。“茶杯”在实体外也兼营网上平台，内容涵盖生活悠闲到国际关系，陶培康不讳言有时会为网站内容担

忧风险，“会无缘无故发恶梦。之前比较严重，现在算是习惯了”。

魔鬼在细节：如何从每个步骤淘汰独立出版

独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独立办公室，由此今后便可能因此难为要出版的书籍申请到ISBN书号，“香港现在的管治模式正是这样：透过条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业者”。

只是习惯了，而非恶梦不再。无法判断的风险导致恐惧，是为一种白色恐怖般的氛围。社会气氛趋向肃穆之时，即使出版人努力撑开自由空间，也未如往日容易。杨子俊提到，国安法实施以来，每个出版机构都有不同考虑，恐惧叠加，导致出版物胎死腹中。

据他说，实际上独立出版如今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关，过去不会有或少有的关，例如自选题开始，编辑已需要评估内容有无触犯国安法风险；接下来，有无印刷厂愿意承印这本书；然后是发行，甚至有的书印好了，但都没发行。如此一来，出版社洽谈的项目中，大约只有1/3最终能顺利面世。

又如“茶杯”曾打算将书中插图印于伞面，作为周边产品配合推书，但这也遭遇制作公司不愿承接，称担心要把雨伞从中国大陆运来香港会被扣货，可能蒙受损失。甚或近期印刷厂因疫情经济不景而结业，精装书的特别效果都已愈来愈难在港做到，所以陶培康也同意现在出书“每个步骤都有挑战”。

近月有独立出版社表示，申请国际标准书号（ISBN）遇上阻滞。过往，机构都只须向香港公共图书馆辖下书刊注册组，递交申请表及商业登记证或社团注册证明书即可申请到书号。申请须知虽列明“或需额外提交营运地址证明”，但小型出版社向来以通讯地址申请亦可获批。

可是近月，有出版社被要求提供水电费单一类文件，用以证明机构于该处营运。有业者认为，独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独立办公室。申请程序收紧可能对微型出版社形成压力，陶培康说，“香港现在的管治模式正是这样：透过条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业者”。





茶杯杂志出版书籍。摄：林振东/端传媒

业界另一隐忧在于法定机构香港艺术发展局（下称“艺发局”）因委员推选方法修定而可能带来的变化。作为半官方机构，艺发局多年来扶助新进和小众创作，补充市场以外版块，维持香港在地艺术生态的多元性，如同其他文化生态较健康地区，此类资助本是一种常见文化政策。这也是长期以来，不少独立出版社旗下书籍的启动资金来源。

譬如以文学类型来说，小说较为普及，易获得市场支持；但诗集读者群就有限得多，很多时候都需要资助出版。艺发局2020年批出28个文学出版计划；2021年上半年更批出23个出版计划，下半年则暂未公布数据。但随著艺发局今年6月公布修定审批委员产生办法，业界担心局内组成改变，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资助审批方针。连安洋预视“未来出版物可能要找其他资助”，“没了艺发局，大家要回到自力更生的情况”。

移民潮之冲击：危，抑或机？

2022上半年，移民潮效应逐渐浮现，“移民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中产，艺文活动的关键受众，他们离开对书业有一定影响”。而整体经济下行，人们没太多收入也就没闲暇付钱买书。独立书店愈开愈多，多少也会分薄市场。

自力更生，不靠资助，就得放眼市场。但香港读者可否撑起本地出版业？陶培康憧憬日本的情况：一个作家写成小说出版后，可以变成漫画、动画、电影、真人版电影，“做一个故事，有好多方式去卖钱，滚存生命”。这样成熟完整的产业炼恰是香港缺乏的，没有成熟的产业链去巩固产品的版权（IP），便“养不活一

群想做这件事的人才”。

另一方面，近年社运和疫情交加，百业萧条，独立书店却如雨后春笋，何杏园形容是“逆市奇葩”。独立出版社 dirty press 总监张小鸣也发现不少消费者带著“扶弱”心态，主动选择独立书店。那么独立书店的声势壮如“复兴”，是否可以有助独立出版社的生存？

兼营书店的连安洋不那么乐观。他见证2020年下半年书店生意兴旺时期，人们一批一批书买走，甚至听到客人说“离开香港前要来买书，带去别处保存”。一年半之后，移民潮的效应逐渐浮现，“移民大多数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艺文活动的关键受众，他们离开对书业也有一定影响”。再者，整体经济下行，人们没太多收入也就没有那种闲暇付钱买书。独立书店愈开愈多，多少也会分薄市场。书店生意回复平静，甚至销售比往常更低，“卖书去货慢了，也听闻其他书店都觉得销情淡了”。



湾仔富德楼艺鹤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撇开移民潮因素，读者数量下降更是全球书业共同难题。以实体书为主的出版社长期被视作“夕阳行业”。从事出版多年的Daniel明白，今人看手机时间一定多过看书，“就算买了书，也不一定会看。可能纯粹是消费选择，用消费去表达态度”。面对网络挑战，张小鸣则相信借用社交媒体的传播有助开拓新读者，如欧美出版同业通过 Tiktok 介绍书籍，青少年读者不跌反升；而电子书和声音书也都是可以接触新读者的渠道，

出版的重点在于内容，多于什么载体。

既有移民潮，香港出版业是否也可外移？陶培康曾私下建议一些作者没有必要在香港做书，只要有心追求品质，人在何地都可以实践，而有这想法的，在独立出版界，不止他一人。

既然留下来，还剩什么书可以出？

“纯粹惊，不去碰，只会愈缩愈后。我们会在灰色地带思考‘怎样表达，而又不犯法’，尽力维持出版自由。”

Daniel 承认“有种”可能已在“某个名单”之上，出版物可能随时被指犯法，出版人也可能有被捕风险。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有种出版过多本社运书籍。国安法之后，Daniel减少出书，“想沉淀一下，思考还有什么书可以出”。出版空间在他眼中“仍然很阔”，还有好多议题可继续说，何况“我们也只是探讨道理，说事实而已”。

沉淀过后，“有种”今年准备了两三本新书，“纯粹惊，不去碰，只会愈缩愈后。我们会在灰色地带思考‘怎样表达，而又不犯法’，尽力维持出版自由”。在他眼中，所谓“一言堂最和谐”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言论自由造就的多元文化，优势在于“十把声音即使九把都没有用，但只要有一把声音是对的，仍然可以推动社会向前”。与其自我审查到什么书都不做，他宁可面对法例，继续出书，让不同作者提出不同说法。





有种文化的出版书籍。摄：林振东/端传媒

张小鸣的dirty press 2008年成立，一向出版性别议题、性小众等书籍，他也观察到，其实香港独立出版一直以来紧贴社会议题和气氛出书，惟自国安法出台，因红线不清晰，业界“接近大半年都不怎做书，惴惴不安；之后，大家开始尝试摸索，慢慢回复过来”。“继续紧贴就会容易触动红线”，业者或无奈调整策略，或者直接选择离开——移民或转行。

留下来的人，张小鸣则认为转向多做“基础工作”（groundwork），倡导普世人权和价值。正如虽然中国大陆常年言论受限，但张小鸣提到大陆出版社和书店“打擦边球”至今，“大陆政策也是时紧时松，书店和出版社无奈，但都忍辱负重坚持”。

香港的前景，不灰暗吗？ “起码大家见到我们都曾经努力过。”

“香港的独特性还是无可取代。”Daniel 相信，香港曾经是最自由的地方，在这环境长大的一代只要一天还活著，就还有机会碰撞出各种创意点子。“虽然好多人离开，但很多年轻人还在，而且都好聪明”。面对同业转行和移民，他视为“新陈代谢”。张小鸣近年也为新一代举办“编辑训练班”，培育新血同时，亦见识到青年人的理想，“只要香港有一部分年轻人依然保持这份追寻和生命力，我不觉得香港的前景好灰暗”。即便眼下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界，看上去噤声了不少，他也理解是大家都只想继续留在这城，默默做事，“情势比人强，唯有做回自己，透过出版寻回我们的独特性”。

“香港人不只懂得赚钱，我们也会争取自由和民主。”杨子俊眼中，依然可以透过出版来实践自由意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可以做到，让有同样价值的人知道，这些价值尚未消失”。以在商言商而言，他坦言前景确实不明朗，但山道文化的销售目前能做到收支平冲，那么自己即使面对压力也会继续：

“相信那些价值，但不去实行，就失去意义了。”